
从一份伪造的“作战命令”谈起

李惠兰

笔者在读《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时发现,两书均引用了一份1937年7月29日午前10时发布于军司令部的二十九军“作战命令”,后面印着宋哲元的名字。但笔者仔细阅读之后和曾见过的一份宋哲元发布的7月16日作战命令内容相比较,认为7月29日的作战命令漏洞百出:1. 赵登禹已于7月28日战死,军长怎么还在7月29日仍给他布置军务?2. 笔者查阅七七事变后档案资料未见有国民政府允准三十七师、三十八师改称第几路军的文件,而这份命令中宋哲元怎能未经批准直接将师改为路军?3. 冯治安是主战的,当时是北平城郊数万军队的主帅,7月16日的作战命令已命他为总指挥官,怎么相隔12天之后又把他降为副职(军队中由正职降为副职等于削了兵权)而换上了主和将领张自忠?4. 这份“作战命令”不像一个用于立即作战的命令,它和7月27日宋哲元拒绝日方最后通牒和所发自卫守土通电主意不符。5. 番号不全,没有编号。7月16日的作战命令番号为“陆军第廿九军作战命令”,编号为“战字第一号”,是命令的正规写法。而这件命令用简称,而且没有编号。6. 此件命令在“军特务旅孙玉田(欠第

前书作者熊先煜、张承钧,后书作者赵学芬、张承钧,两书由北京出版社1990年、1992年先后出版。

一团团部及第一营)”下面加注说:“营相当于日军大队编制”。二十九军与日军混驻在平、津地区已数年,日军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的营,这种一般军事常识即使一般士兵也清楚,怎么在二十九军的作战命令中会出现“注”,这真是一种奇怪现象。7. 此件命令的时间是“7月29日午前10时”。但这时南苑战斗已于头一天失败,宋哲元等已到保定,第三十七师正在南撤。如按此命令,张自忠本应以“第一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指挥作战,而此时他正以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北平市长的身份,忙于改组政委会,“与日军周旋”。此时此景,宋哲元怎么会签署这样一个不符实际的命令呢?

为此,笔者在所编《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中引用了台湾出版的“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革命文献》106辑“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中的宋哲元签署的7月16日作战命令,给史学界核对真假史料提供一个方便。

为了对史料负责,笔者又翻出了1992年由抗日战争纪念馆带回的那份7月29日“作战命令”原稿的复印件,据说这是日文译件的原稿。仔细观察上面是硬笔书法,写得很规矩,但命令的时间是后来用毛笔填写的(毛笔字是七月二十八日午前十时)而“前”字下面又盖上了一个硬笔字,使人看不清。这份伪件是8开纸共5张,其中3张上沿有勾划涂改痕迹。仅此两点说明这不是一个正式文本。在非正式文本上却有宋哲元的签字盖章,就更不符合逻辑了。“作战命令”应该是一个极严肃的文件,其时间,内容必须一字不差,这关系到千万人头落地的大事,作为发布者怎能在一个涂涂改改的草稿上签字盖章?伪件上硬笔书法的宋哲元签名笔体和整个文件抄写者笔体相似,而笔者找到了5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宋哲元签字来核对,证实伪件上的签字是假冒的(笔体不同)。又找到1935—1940年宋哲元的公务用章核对,更证实伪件图章是假的,真图章印形比伪件大,四周细边,这么细的边不是极好的刀工和好石料是刻不出来的,所以宋哲元以此做为权力象征的官印,7月16日报国民政府的作战命令就是用的这个印章。在北京档案馆有

宋哲元的签名和公务用章印模,可供史学工作者查询研究。所谓7月29日“作战命令”十分明显是伪造的,但它竟然在事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出现在史学界,并为研究者引用,以为张自忠“临危受命”的依据,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件伪作干扰了我们研究历史十几年,看来该结束了。下一步应该研究伪件发布者,“日本驻中国第一联队战友会”在1987年公布伪件意图和1937年日本阴谋瓦解二十九军有什么关系。

二

近年来在七七事变史研究中有两股不正之风,一是伪造史料,篡改历史,二是让不能说话的古人为今人服务。伪造史料的典型事例即如前述。伪造历史典型的另一实例就是在《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李致远的一篇文章——《张自忠谈留北平的经过》。这篇文章被辗转引摘,作为张自忠“临危受命”的旁证材料。笔者认为李文所说是弥天大谎,今将原文公布让史学者去分析。

张师长说,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京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指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冯为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主席,驻保定)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刘为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主席,驻张家口)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负重,好自为之。”

宋还对张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

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指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张先不愿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张对我说:“这些情况别无人知道,我只与你说了,暂时不向别人说。”

笔者认为这篇文字与历史不符之处很多。作为史料,起码应在时间、地点、人物方面无误的情况下才能引用,而李致远这段话一没时间、二无地点、三人物不对,现分析如下:

(一)李致远“史料”提供的两个时间都不对。一是“张师长说7月中旬他奉宋密电抵平”,而实际上7月11日—19日宋、张都在天津;二谈话内容有“赵已阵亡”,查赵登禹阵亡是7月28日,这一天之前,宋、张不可能预见赵会阵亡,而7月28日下午会议是5个人在场(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宋哲元与张自忠没有单独见面的机会。如果对话是在张自忠由北平逃出之后,宋、张这种对话则是没有必要的了。

(二)李致远“史料”没有提供地点,宋、张二人单独对话到底是在北平?还是在天津?还是在抗日后方?对不上碴。

(三)李致远“史料”所说张自忠“临危受命”的场合,按实际情况共5个人在场,却没有宋、张以外其他3人的旁证。

实际上,李致远也不具备提供这段“史料”的条件。他当时身份是独立二十六旅的旅长,张自忠任天津市长时他驻守廊房。张自忠1937年7月25日去北平时,连他的副师长李文田都不知道,李致远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若是谈话发生在张自忠1937年12月7日由南京释放回到五十九军(原三十八师升格)之后,就更不对头了。

此时的张自忠对日寇怀着满腔仇恨,他说的是“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已经不可能说出那段“机密”话了。因此,笔者认为此段“史料”纯系李致远个人胡编乱造的,不应该当做史料引用。

再举一典型实例,就是林治波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张传》)。笔者想对该书中的几个历史事件与林先生商榷。

1. 关于喜峰口抗日前敌总指挥问题。喜峰口抗日是中国长城抗战的一部分,取得了“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武装抗日的胜利,但距今仅仅65年,其英雄事迹就有人篡改。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有两个:一个是由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任命的第三军团(由第二十九军组成)总指挥宋哲元;另一个是由宋哲元任命的喜峰口作战军前敌总指挥赵登禹。由于总指挥部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战斗口号激励士兵,和赵登禹将军在前线作战受伤不下火线,得以了解到敌之弱点,而改用近攻夜袭,才能够以大刀片、手榴弹,战胜拥有机枪大炮之敌。这些情况除当时报载以外在1933年出版社出版的《长城血战记》和《察哈尔省通志》上都有明确的记载。1985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的《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留有宋哲元的详细作战笔记。但是在《张传》(87页)却说,“张自忠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并在该书95页配上一幅张自忠当时的军装照及说明。这完全违反了历史的真实。

再翻开《张传》第93页,在一照片下写着“图9,二十九军大刀队杀敌用过的大刀”(未写引自何处,笔者),图下文字配有二十九军团营阵亡者的名字和辉煌战果。打开《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28页,也可看到同一照片,连说明都一样:“二十九军大刀队杀敌用过的大刀。”在《张传》106页,又看到一张下写“图11,1933年与蒋介石、宋哲元等留影(左起:张自忠、宋哲元、蒋介石、杨家泰、冯治安)”的照片。笔者翻开了《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上册第25页,同样一张照片下面的解说词是:“先总统蒋公于民国二

十二年长城战役时赴保定巡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公请示机宜后合影。再用《长城血战记》和《赵登禹将军》中赵登禹的照片和《张传》图 11 注释的张自忠照片对比,看来林先生把 1933 年宋哲元身边的赵登禹改写成张自忠了,以示长城抗战时张在宋身边。《张传》第 99 页最后一行写道,“二十九军大刀队随之扬名宇内”,“张自忠与宋哲元、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这一表达,头功就是张自忠的了。可是事实上国民政府是怎样表彰的呢?赵登禹是头功,他由旅长提为师长,授青天白日勋章,他所领导的第一九旅升格为第一三二师;刘汝明在罗文峪战役有功,其暂编第二师纳入正轨编为一四三师。

2.《张传》把宋哲元的功绩移给了张自忠,而把张自忠的过错推给了宋哲元。《张传》第 80 页,有一段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张自忠练兵时在每日的朝会上进行国耻问答的记载: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应当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这段使人感到“面熟”的记载,虽然下面注了引自 1971 年《大众杂志》(没说是大陆,还是台湾出版,所以无从查找核对),但笔者在《张传》出版的前 8 年,就在《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下册第 983 页看到了陈桂华先生在宋哲元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专辑上的发言记录。陈是宋的老部下,他回忆:宋哲元平日训练部属就特别注意毋忘国耻的教育,譬如每日朝会中,带兵官必与士兵高声问答,而“问答”内容与《张传》记载完全相同。林先生却巧夺天工,宋哲元的“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治军原则及练兵方法,很巧妙地移到了《张传》上,变成了张自忠的。

《张传》中关于“抢功”的文字不仅一段,如99页、113页、150页,都较明显,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下面再举几个“推过”的实例,即张自忠率冀察平津国外旅行团访日问题。张自忠当时是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他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率领几十人的访日“旅行团”去日本晋謁天皇,这次行动可以说是张自忠在中日问题上的一个亮相。《张传》168页用参事边守靖的话表达,安排了“宋委员长也可以回老家休养休养……市长也可以去日本走一趟,访问访问”;“张自忠沉默良久未加可否”;“既然日方发出约请,幕僚又有此建议,冀察当局遂开始考虑组团访日事宜”。“宋哲元考虑到自己作为冀察当局最高领导人亲自访日,一旦日方就经济提携等问题提出无理要求,我方势必失去回旋余地,故而决定由张自忠率团访日”;于是这个“旅行团”就组成了。笔者认为,宋哲元是不是曾这样考虑过,历史上没有见证。七七事变前夕宋哲元拒绝访日而回山东,张自忠率团访日,两人行动明显存在分歧,一个小小的市府参事边守靖怎能决定张自忠的行动呢?

三

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离平赴保定,张自忠留平。围绕宋张去留问题,历史研究中有“逼宫”和“临危受命”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愿就此问题作一分析。

(一)第二十九军的成长与发展。

第二十九军建立于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之后,由西北军残留人员所组成。宋哲元是原西北军的五虎上将(集团军司令)之一,冯治安、刘汝明都是原西北军的军长,张自忠是原西北军的师长。在组成二十九军时,由于人多编少,很多下级军官降为士兵。在西北军的各路人马困居山西一隅之时,高级军官也只能降级使用。论资排辈,大家公推宋哲元为军长,刘汝明先为副军长后任师长,冯治安由军长降为师长,赵登禹由师长降为旅长,张自忠因残留军队人

数较多而保留原师长职位,但番号排在冯治安后面(冯治安是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则是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是个人保留队伍人数多,二是非宋嫡系,所以宋哲元对张自忠保持“客情”。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张自忠接替秦德纯担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又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成了日本注意的目标和汉奸宵小包围的对象。1936年,由于日寇咄咄逼人,宋哲元做了人事调整,将军参谋长张维蕃调为平绥路局长,并给他一个旅的军队(穿保安队制服),既保护了铁路沿线二十九军的后方,又和汉奸陈觉生的北宁路局相对抗。同时,宋把自己原任的河北省省长让给了冯治安,三十七师守北平城郊,调赵登禹为河北省保安司令。而对于张自忠要求三十八师单独增加两个团的兵力,则通过萧振瀛予以劝阻。另一个人事调动是二十九军参谋长空缺,调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担任,而三十八师参谋长张克侠则为军参谋长的副职。刘汝明仍驻察哈尔省。笔者认为,宋哲元这种调动安排有平衡二十九军内部和抑制张自忠权力的意图。

(二) 张自忠访日埋下“逼宫”的祸根。

1937年4月23日张自忠率冀察平津国外旅行团几十人访日。在华北地区中日矛盾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张自忠率团访日,并晋謁日本天皇,这在当时够的上是爆炸性新闻。旅行团虽然用“冀察平津”名义,但冀察总头目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北平市长秦德纯,河北省保安司令赵登禹一个也没去,只有天津市长张自忠任团长和一个没有什么实权后来成为汉奸的张允荣任副团长。

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张传》说张允荣是河北省保安司令错了。张允荣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副官长,随冯去过苏联,西北军失败后张允荣收罗一百多人活动于察北沽源一带,自称沽源县警备司令,后参加抗日同盟军,被收编后留在察哈尔省吃处长官薪,是个小政客。张自忠由察哈尔省调任天津后张允荣随行至津,后沦为汉奸。以上为笔者1989年采访朱军后,由朱军提供的文字材料。朱军,中共党员,曾任第二十九军军训团副大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院长,笔者按。

对于张自忠访日,秦德纯回忆:“日方于二十六年春,坚约张将军(自忠)赴日参观,因此张将军便成为了众矢之的。”这段话证实了日方的主动约请和张自忠的“愿者上钩”。再由《中央周报》透露:“旅费明虽由冀察政务委员会负担,实现此行纯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部的约请,而由退还庚子赔款之一部拨充用费,冀察政委会则所出无多……(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宋哲元本人原不主张派员东渡,惟此中有人为张自忠运筹帷幄自命不凡者,极力怂恿张领导前往,迄今外间对该团多所传述,但已不能影响该团之行矣!”另外,寺平忠辅透露,当时日本原任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他的指示是:“我们应尽全力谋求与冀察亲睦提携,打入其心中,诱导其成为日本伙伴。”而继任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亦由于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宋哲元趋于“中央化”,而抗日的空气已弥漫平津,为此提出“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约请张自忠到日本去看看,作为“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这一项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宋哲元只是迫于形势,不好不同意而已”。

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先是约请宋哲元,被拒绝后而“将目标转向张自忠,因为他在二十九军中地位重要,所部三十八师坚强有力,企图把二十九军的二级将领拉出以实现‘华北自治’”。笔者认为,约请二十九军将领访日是日本侵华阴谋的一个棋子,也是一个圈套,所以当“旅行团”抵日之后,受到的是“国宾”

《秦德纯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87页。

《冀察派员赴日考察》,《中央周报》第463期,1937年4月19日。

[日]寺平忠辅:《卢沟桥事件》,日本读卖新闻社1970年版,第44页。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75页。

董升堂:《张自忠将军生平概述》,《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待遇,规格甚至超过了在此之前访日的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张群。超越张自忠身份的“天皇晋见”,不能不对张自忠产生重大影响。从另一角度看,张自忠访日违反了国民政府两点纪律,一是地方政府(指冀察政务委员会)没有外交权,二是军人不许从事外交活动。他在未获得蒋介石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赴日并获得日本对他的高级礼遇,这个行动早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了,当然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注视与责难。英美驻华使馆对此也很关注。各方对宋哲元增加了怀疑,宋哲元为了表明自己不想把冀察政委会变成“华北国”而采取了与张自忠相反的行动——去山东乐陵。所以笔者认为宋哲元拒绝访日邀请是一个政治态度,他没有必要再派张自忠去。张自忠访日虽然是日方约请,但他应该自己对这事件负责,这是他想取宋而代之的先期工作。宋哲元此时主要是加强冯治安的权力,在他回山东时委托冯治安代位二十九军军长,又一次重申冀察政权对日谈判由秦德纯负责。而张自忠由日本回来后对日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似害有二种病,即(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至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他以三十八师为后盾,变成了二十九军中主和派的中坚。

(三)《香月细目》的签订使张自忠跌入日军所设陷阱。

西安事变后宋哲元的思想言行趋于“中央化”,1937年元旦他发表的《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特别提出,“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1月20日他在天津发表《会衡通令》再次提出:“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侵占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倒他”。随之,他不顾日人的激烈反对,撤掉了冀察政权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中孚(代之以贾德耀),并派秦德纯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秦德纯开会回来宣称,“冀察外交今

《卢沟桥事件第16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
《北平时报》,1937年1月21日。

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策”。宋哲元接见中央社记者时亦公开宣称：“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他还接纳中共中央代表张经武进驻冀察绥靖公署，成立军事训练团，参谋训练班，恢复大中学生暑期军训，聘请进步教授张友渔等上课。这些具体作法都可说明宋哲元已决心放弃原西北军的小团体主义，广泛联合抗日力量，并主动服从“中央”。

七七事变爆发后，武装吞并华北和全面亡华已是日本的国策。7月8日，日军自晨至晚，对宛平城实行3次攻击。此时北平的二十九军将领积极准备抗敌，如秦德纯即曾电话命令吉星文团长“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失守”。北平于同日戒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任戒严司令。对于此时二十九军将领之内情，据《卢沟桥事件第16次会报》透露：“卢事发生后，8号及10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前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于是8日晚下反攻命令。殊日人方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乃收回反攻命令。至10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宋到天津后为许多亲日分子所包围，形势乃不佳。”“又据北平消息，日方及汉奸对宋部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又对张自忠部下则谓仅打冯治安部，不打张部等语”。

为了施实“缓兵之计”，并压迫第二十九军妥协，日军与冀察当局进行谈判。冀察政权对日交涉事务长期以来都是由秦德纯负责。秦德纯是蒋、宋都认可的合适人选，因为他没有兵权，又和二十九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8日。

《益世报》，1937年3月11日。

《张经武》，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9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

《卢沟桥事件第16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

《卢沟桥事件第4次会报》，《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军有密切关系,符合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人不外交”的戒律,不会因长期和日方接触而产生乱子。因此,宋哲元在临去山东前将对日谈判权交给了秦德纯,但在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尚在山东之时,张自忠、张允荣就插手谈判。日军则抛开秦德纯,于7月10日夜直接到北平椅子胡同的张自忠公馆协商停战协议。谈判条件,从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后来发展到“罢免由营长到宋哲元的直接负责人”,而中日谈判的中方代表则由秦德纯为主而移到以张自忠为主。在7月11日上午,张自忠在张允荣私寓和松井太久郎在齐燮元起草的“协定”草案上达成一致。当日晚6时30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回到天津时木已成舟,汉奸齐燮元、张允荣等人,不仅控制了张自忠,并利用张自忠包围了宋哲元(“据北平私人电话,宋为亲日分子齐燮元,张,张允荣、陈觉生四大金刚所包围”)。“16日晚间,香月清司接获东京陆军省指示,限期要求宋哲元答应日方条件,香月乃于17日通知宋氏,限宋于19日以前承诺”。“宋哲元亟欲离开天津,日方初不同意,据香月清司回忆录透露,宋表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香月始同意宋离津赴平”。在张自忠倚重齐燮元、张允荣与日军谈判的时候,宋哲元作为二十九军军长在天津三十八师驻防地却被包围被监视,甚至给保定的蒋介石代表熊斌打电话都说“彼在天津不能有明白表示”。还有人披露,“其时蒋从情报得悉日本与汉奸及张自忠等有阴谋对宋哲元下毒手的消息曾迭电宋注意”。在宋离津之后,7月20日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中日谈判《协定细目》上签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6页。

《卢沟桥事件第4次会报》,出处同前。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345页。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27页。

总统府档案《革命文献》抗战时期第1册,第97页。

李世军:《宋哲元与蒋介石关系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了字。日军此时认为宋哲元对他们已无用处,曾在杨村大桥设炸弹企图将宋炸死。

(四) 7月28日北平会议的悲剧。

在卢沟桥事变后中日现地交涉的过程中,也可看到日本企图分化二十九军的阴谋。事变之前,日本先把宋哲元当做吞并华北的筹码,几次要他签约,都被他躲过了。这使日军方感到有在二十九军中另寻一合适人选的必要。先是萧振瀛,经过萧在天津市任了一年多市长的表现看,他的作法是口头承诺而事后不认帐,不签任何条约,加上他没有什么实权,日军方乃决定把目标转向张自忠。张自忠自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后,汉奸乘虚而入,纷纷和他拜了把兄弟。这些人对张进行挑拨离间,为张出谋划策,例如他们散布宋已接受日方1000万日元和大量军火,并已秘密在《华北防共自治协定》上签字等等。这些谣言使宋哲元丧失很大威信,并引起了部下对他的怀疑和不满。

张自忠则因1936年宋哲元的人事调整把最大的地盘河北省交给冯治安而不满,在汉奸挑动下产生了“取宋而代之”的野心。所以,笔者认为七七事变后整个“和平”谈判,既非宋哲元授权于前,亦非宋所同意于后。张自忠既欲夺权,必要以军队为后盾,所以在1936年底趁宋哲元对北平城防调动之机,将三十八师独立三十九旅阮玄武的队伍插入北平,旅部及大部分兵力驻北苑,另有一营驻天坛,这一支军队只听张自忠一人之令,他们对日军的态度与三十

史称《香月细目》内容共7条:1. 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2. 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3. 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4. 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5. 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6. 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7. 撤去在北平城内的三十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载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84页。

据史民:《卢沟桥事变秘史》,香港时代出版社1962年版,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后结拜了7个把兄弟,即齐燮元、张璧、张允荣、边守靖、潘毓桂、齐协民、马彦珩。

七师截然不同。当时老百姓流行的话“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指的就是这部分同在北平的二十九军的队伍。宋哲元对这部分人号令不了，既不敢让他们守城，亦不敢调他们离平（怕因此和张自忠矛盾公开化）。这一支劲旅 6000 人，即是张自忠逼宫的实力，如果他们奉张之命行动，自己人和自己人在北平城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宋哲元能控制指挥的北平城内军队只有石振纲的 4 个团（其中之一就是守广安门的刘汝珍团）。石振纲是赵登禹的部下（属一三二师）。7 月 28 日中午获得赵登禹牺牲的消息，下午开会讨论打算由秦德纯留守北平指挥的就是石振纲的 4 个团。7 月 28 日下午在北平的 4 人会议（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是研究北平防守问题，并非二十九军全体高级将领会议，因为刘汝明、张自忠都应在自己驻军防地准备作战。据刘汝明在回忆录中说，“接宋军长命令立即返察准备 8 月 1 日行动”，所以说此次会议张自忠是突然闯入，笔者认为是对的。张自忠自 7 月 25 日擅离职守由天津到了北平至 7 月 28 日共 3 天，这 3 天中有记载的是他和张璧、潘毓桂在一起筹划和平，到底怎么筹划，因当事人已死，无法了解。但从七七事变前后的情况来看，宋、张主张并不一致。张自忠率团访日，宋哲元为避日纠缠而回山东（一共两个月时间，在山东乐陵共招募子弟兵 800 人，全部交给佟麟阁的军事训练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即力主“和平”，阻止反攻，主动签停战协议，宋哲元于七七事变后先发电报力主消灭当前之敌，后于 7 月 16 日发布《作战命令》力保北平、卢沟桥及丰台；7 月 25 日之后，张自忠只身抵平和汉奸张璧、潘毓桂策划“和平”，宋哲元却下令刘汝珍团抵抗，7 月 26 日下令廊坊守军抵抗，7 月 27 日拒绝日方最后通牒，发出自卫守土通电并报告南京政府决心抵抗。

宋哲元拒绝日军最后通牒的意见和所发自卫守土通电，是以

《革命文献》第 106 辑，“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处 1986 年版，第 148 页。

实际行动公开撕毁《香月细目》，这和想以“协定”来制止战争的张自忠所为显然完全相反。所以，7月28日张自忠闯入会场之后二人发生争吵，宋认为张不应擅离天津，张认为宋的做法错误，他以为日本人只是对宋、冯不满，如果自己出来主持冀察，则和平完全可以维持，二十九军的地盘仍可保留，所以有“如果委员长暂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之说。宋哲元大敌当前，是和张自忠兄弟阋墙呢？还是忍气退让赴保定重组抗日力量？请看萧振瀛的回忆：“余在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闻而感慰曰‘一定效死疆场以报国家’。又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荏忱（张自忠号）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秦德纯号）遂立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冯治安号）归拢部队南下’，叹曰‘荏忱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此次会议，宋手书“三个代理”交张，匆匆率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离平。后来石振纲不愿投降而突围赴察哈尔投奔了刘汝明，阮玄武旅全部投降变成保安队受日军指挥。

（五）“临危受命”受的什么“命”？

笔者认为，张自忠7月29日到冀察政委会赴任，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并非“临危受命”，而是执行《香月细目》。他将原冀察政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而换上了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宣布潘毓桂为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并“大开城门，撤除警备，且与松井商日兵开入问题”。实况的记录，说明张自忠逼走宋哲元之后的所做所为仍是为了“和平”，为了忠实

何基沅等：《七七事变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萧振瀛回忆录：《华北危局纪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中国的抗战》第1集附录，《密勒氏评论报》1938年8月发行，第38页。

实际行动公开撕毁《香月细目》，这和想以“协定”来制止战争的张自忠所为显然完全相反。所以，7月28日张自忠闯入会场之后二人发生争吵，宋认为张不应擅离天津，张认为宋的做法错误，他以为日本人只是对宋、冯不满，如果自己出来主持冀察，则和平完全可以维持，二十九军的地盘仍可保留，所以有“如果委员长暂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之说。宋哲元大敌当前，是和张自忠兄弟阋墙呢？还是忍气退让赴保定重组抗日力量？请看萧振瀛的回忆：“余在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闻而感慰曰‘一定效死疆场以报国家’。又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荏忱（张自忠号）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秦德纯号）遂立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冯治安号）归拢部队南下’，叹曰‘荏忱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此次会议，宋手书“三个代理”交张，匆匆率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离平。后来石振纲不愿投降而突围赴察哈尔投奔了刘汝明，阮玄武旅全部投降变成保安队受日军指挥。

（五）“临危受命”受的什么“命”？

笔者认为，张自忠7月29日到冀察政委会赴任，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并非“临危受命”，而是执行《香月细目》。他将原冀察政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而换上了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宣布潘毓桂为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并“大开城门，撤除警备，且与松井商日兵开入问题”。实况的记录，说明张自忠逼走宋哲元之后的所做所为仍是为了“和平”，为了忠实

何基沅等：《七七事变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萧振瀛回忆录：《华北危局纪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中国的抗战》第1集附录，《密勒氏评论报》1938年8月发行，第38页。